

●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资助出版

刘勰 《诗经》研究

胡辉
◎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序

《文心雕龙》是中国成就最高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甫一问世，立刻为时人所重视。由于各种原因，隋朝到元朝的近八百年间，虽然偶有学者提及此书，但一直显得比较冷寂。明清两代，关注此书的学者逐渐增多，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更是得到进一步发展，一大批有献身精神的学者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文心雕龙》的研究已成为一门“龙学”，俨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显学。

胡辉同志长期致力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持之以恒，勤于思考，令人佩服。记得当年，我在给研究生讲授“诗经研究”这门课程的时候就曾说到，我在山东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听我的老师董治安先生讲到，《文心雕龙》有很多篇章谈到《诗经》和《楚辞》的内容，那是刘勰的“诗经观”和“楚辞观”，希望同学们加以关注。谈者有意，听者也有意。胡辉同志正是听者之一，也就是说，胡辉同志当时已经有了对刘勰诗经观问题的思考。过后，他交了一份《文心雕龙》引《诗》和用《诗》的作业。其后，就有了他的《刘勰诗经观研究》的硕士论文。再其后，他执教于新疆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和云南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继续倾注更多的精力于有关资料的搜集、辨析，思考也越来越成熟和深入，并且有了《“依经附圣”、“会通适变”与“征实直笔”——刘勰史著编纂原则刍议》《刘勰论史书撰写之叙述三美原则》等一系列公开发表的论文。现在，这部《刘勰诗经观研究》书稿即将出

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也是胡辉同志多年心血和勤奋的见证。《刘勰诗经观研究》是一部学术研究性的理论专著。从文学或文献的角度上说，此书有几个突出特点：

其一，观点鲜明，立论可靠。对于刘勰的出身及生平问题，学者们历来争论不休，胡辉同志通过对刘勰生平事迹的梳理及简单勾勒，窥探其艰苦而又曲折的心路历程；并论述了儒、道、佛三种思想互相补充，对刘勰立身行事、著书立说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对刘勰诗经观的产生之时代背景的分析，更是可圈可点，见解独到，富有创新意义。

其二，材料翔实可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作者通过对《文心雕龙》引用《诗经》成辞情况的整理、考证，发现《文心雕龙》全书 50 篇中有 45 篇明引或暗引《诗经》成辞达 154 处，覆盖全书 90%，内容涵盖《诗经》的风、雅、颂各个部分，涉及《诗经》的作品 94 篇，占《诗经》总篇目的 30%。我们知道，当时在刘勰的面前，历史上留下来的创作实践一是《诗经》，二是《楚辞》，三是汉大赋，四是历史散文及五言诗等等。为什么刘勰选择《诗经》作为他的论述对象呢？胡辉同志通过对《文心雕龙》引用《诗经》成辞的梳理，说明刘勰的创作观念如何有力地落实在创作实践中，创作实践又如何有力地支撑刘勰的创作观念；又说明刘勰怎样深受《诗经》的影响，以及《文心雕龙》与《诗经》有着怎样深刻的渊源关系。不难看出，刘勰对《诗经》的稔熟程度达到了如数家珍、信手拈来的境界。

其三，胡辉同志能对研究的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对问题有着深入的分析和论述。众所周知，黄侃、刘师培、范文澜、刘永济、牟世金、詹锳等前辈和大师们把《文心雕龙》的研究分为文体论研究、创作论研究、风格论研究、批评论研究等等。我们顺着这个思路，亦可以把《文心雕龙》的研究分为刘勰的诗经观研究、刘勰的楚辞观研究、刘勰的汉大赋观

研究等等。胡辉同志认为，从《文心雕龙》的写作样式、语言措辞和思想依归来看，《诗经》之于刘勰，不仅是研究对象，还是尊崇的对象，刘勰对《诗经》的态度不仅是后世学者对其的态度，更是作为创作者对之前重要的文学、思想、文本的学习、吸收和涵化，特别是涵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价值。

其四，胡辉同志的著作表现出其对实际问题有着较强的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他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不少的学术探索和学术开拓。如该书的第四部分，论述刘勰的征圣、宗经思想等都做到材料翔实可靠，论述有理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论界确实确实存在着一种“失语”情况，仿佛离开西方的文论话语，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就不会说话了。用现今的语言来说，一个民族的文学，往往是这个民族整体文化的形象而具体的表现，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反映。纵观中国文学史，若以题材来分，有着众多的文体，若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来说，有艺术构思、艺术表现、创作方法等各方面的文艺理论，有着我们“中国式”的特有的文艺理论，如“文与气”“文与理”“文与质”“文与情”“情与性”“情与理”“风骨与辞采”“法度与自然”等一系列范畴与概念，这其中就有一些是刘勰所创造和发明的。《文心雕龙》有近乎全面的理论建树，与当代文论有着许多类同的基本论题，不乏别开生面又独到且与西方文论不同的“中国式”论述。

当然，我们不反对向西方理论学习。但这“中国式”的文论话语，不正是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去深入研究的吗？胡辉同志对刘勰诗经观的研究，正是从深度上拓展了我们对《文心雕龙》所体现出来的极具民族风格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探索。

通过对《文心雕龙》诗经观、楚辞观等的分析，更能够

直接捕捉到中华民族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群体的心理意识及其共性。因此，从文学、文化学的角度上说，文学不仅是文化的重要部类、基本要素，而且是文化的一面镜子，而胡辉同志对《文心雕龙》诗经观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功劳和价值是不言自明的。这对进而研究中国文论中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风格的文学性生成等等，对改变中国文论的“失语”状态，无疑有着很强的实际意义。

综观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心雕龙》研究，其成就超过了以往的一千多年，名家辈出，著述山积。“龙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曾经热闹过一阵，而近年来渐趋沉寂，但是，能在这种沉寂中研究“龙学”的人是真正的学者，胡辉同志正是这样一种人。

我与胡辉同志相识既久，又多交往，是师生，也是同事，更是朋友，深感他是一位重于情义的人，也是一个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人，他在治学上固志而不倦的精神、执着而务实的实践，保证了他的成功，也从另一方面表现了他的为人。有感于胡辉同志此书出版的不易，由衷地为他取得的成绩高兴，因应所嘱，赘语如上，希望胡辉同志继续有新的论著问世。

是为序。

谢明仁

2015年9月于广西大学求阙斋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刍议	(2)
第二节 刘勰诗经观研究综述	(10)
第三节 本书研究内容、基本观点、思路、方法及 意义	(21)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代背景及刘勰生平	(28)
第一节 南朝时期政治、经济、生活风貌	(30)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潮和文学概况	(33)
第三节 刘勰生平及对《文心雕龙》成书的影响	(41)
第二章 《文心雕龙》引用《诗经》考.....	(53)
第一节 《文心雕龙》与《诗经》之关系考.....	(53)
第二节 《文心雕龙》称述《诗经》考.....	(59)
第三节 《文心雕龙》总论引用《诗经》成辞考	(72)
第四节 《文心雕龙》文体论引用《诗经》成辞考	(76)
第五节 《文心雕龙》创作论引用《诗经》成辞考	(98)
第六节 《文心雕龙》文学评论引用《诗经》成辞考	(112)

第三章	《文心雕龙》引用《诗经》论	(122)
第一节	《文心雕龙》引用《诗经》原因探析	(122)
第二节	从《文心雕龙》引用《诗经》看刘勰的 文学观	(127)
第三节	《诗经》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影响	(131)
第四节	《诗经》对刘勰文学史观的影响	(134)
第四章	论刘勰的诗经观	(137)
第一节	刘勰论《诗经》的地位与体制	(138)
第二节	刘勰论《诗经》的形象性	(142)
第三节	刘勰论《诗经》的抒情性	(145)
第四节	刘勰论风、雅、颂	(149)
第五节	刘勰论赋、比、兴	(151)
第六节	刘勰论《诗经》的夸饰及其他	(157)
第七节	刘勰诗经论对后世的影响	(160)
第五章	刘勰与钟嵘诗经观之比较	(163)
第一节	刘勰、钟嵘的《诗经》地位论之比较	(165)
第二节	刘勰、钟嵘的《诗经》体制论之比较	(168)
第三节	刘勰、钟嵘的赋比兴理论之比较	(171)
结 语		(177)
主要参考文献		(180)

导 论

“《文心雕龙》的研究，自明代开始校勘、训诂、评点的基础研究以来，迄今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已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据《文心雕龙学术综览》的统计，截至1992年为止，各国各地区出版的专著共142部，论文2419篇，尚不包括遗珠的篇著……成长速度十分惊人；惟就实质的研究内容来看，据王师更生总编订之《台湾近五十年文心雕龙研究摘要》所爬梳归类，分为刘勰史传、注释校勘、基本原理、文章体类、创作方法、文学批评六大方面、及张文勋著《文心雕龙研究史》将新时期龙学的研究类别，分为校注、翻译、疏证、研究论著（含理论研究专著、研究论文集、文学批评史、美学史中的论述）、刘勰生卒年家世研究、文学理论、创作论等。”^①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开始有研究者对《文心雕龙》引《诗》、用《诗》情况进行研究，对《文心雕龙》与《诗经》之关系做了细致分梳，并有大量成果面世。但由于研究方法、角度、题材取舍等因素的影响，对《文心雕龙》与《诗经》的交叉研究还需进一步拓宽研究思路，加强研究的针对性，深化研究内容，进而全面把握《文心雕龙》大规模引用《诗经》的背后，蕴含着其作者刘勰怎样的机心。由是，在更深广、精细的层面探讨刘勰的诗经观，就成为本书的缘起和笔者所努力的方向。在全面探讨刘勰诗经观之前，首先纳入我们研究范围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研究的概况，以及目前刘勰诗经观

^① 方元珍：《文心雕龙作家论研究——以建安时期为限》，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的研究呈现怎样的态势；同时，本书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思路、方法及意义也将在本章一一呈现。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刍议

在经学史的著作当中，无一例外地把魏晋南北朝看作我国经学衰落的时代。清代经学大家皮锡瑞通过研究经学发展史得出结论：“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①，将魏晋视为经学中衰的时代。到了南北朝，则“自刘、石十六国并入北魏，与南朝对立，为南北分立时代；而其时说经者亦有‘南学’‘北学’之分。此经学之又一变也”^②。

南北朝为经学发展的分水岭，“中衰”也好，“分立”也罢，经学盛于两汉而衰于六朝一直都是主流论调。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它的研究史演变也逃不出上述论断的大致框架。但需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衰落的只是儒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约束力，而非经学，相反这一时期的经学还有了较大的发展，比如牟世金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就说：

仅从《隋书·经籍志》所录经学著作的数量看，两汉四百多年只有六十种，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年而有兵燹不断，却多达二百五十二种。这个悬殊的比例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③

而与这种发展相伴的《诗经》研究也丝毫不见寂寥。蒋方说：

《隋书·经籍志》著录唐初所见到的书籍情况，

①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5页。

②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8页。

③ 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诗经类”所录书籍四十部，合亡书则是七十九部。其中，汉人著作四部，合亡书是八部；魏晋人著作十四部，合亡书则是三十四部；南北朝人著作十五部，合亡书二十七部；包括作者不明者，在实存的著作中，魏晋之书占百分之三十五，如果包括亡书，魏晋时期的著作则占所录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有余。

《新唐书·艺文志》“诗经类”所著录的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书中，魏晋占八家，十八部，在两汉至唐代的四个时代中仍是数量最多。^①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的经学不仅在政局动荡不安的困难环境中坚持下来，还有所发展；特别是从蒋方论述中的数据对比来看，当时的《诗经》研究是相当活跃繁荣的。此外，由于儒学独尊的文化模式被混乱多变的政治局势所打破，文化渐次趋于多元，这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学看法的改变以及多元化，文学批评的新风开始形成，并且在文坛逐渐成为主流。在这种情况下，《诗经》研究就呈现出特有的多彩风貌。在汉代就已经发展成熟的《诗经》经学研究仍在继续，《毛诗》一枝独秀，诗经学文献颇具特色；同时《诗经》的文学研究也大力发展起来，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不仅如此，后者还从此拓展了《诗经》研究的新领域。

一、毛诗学派的崛起与“郑王之争”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古文经学毛诗学派独领风骚，以及在毛诗学派之内，郑学、王学两个派别展开的激烈论争。

西汉时期，今文学派齐、鲁、韩三家《诗》先后被立为官学，盛行于世，无可匹敌。作为古文经学的《毛诗》则流

^① 蒋方：《魏晋时期的〈诗经〉解读》，《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传于民间，影响力有限。哀帝时，刘歆请求朝廷将《毛诗》立为官学，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围攻。虽如此，也未能抑制《毛诗》的崛起，到了东汉时期，《毛诗》的受关注程度已远超三家诗。东汉末年，郑玄作《毛诗笺》（别名《毛诗郑笺》《郑笺》），该书宏通博大，既宗《毛诗》，又融合了三家诗的部分学说，因《毛诗》较之三家诗的谶纬化和烦琐，其内容丰富，通训诂、明大义，而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也标志着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崛起。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毛诗》更是一枝独秀，此时期解《毛诗》的著作数量就是有力佐证。据张可礼考证：“在三国时期，治《毛诗》者最多，共29人，其次是治《韩诗》者，有4人，治《齐诗》者1人。另外1人涉及了4家。”^①另据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一元代）》所著录，魏晋南北朝可考的诗经学著作有111种，其中解《毛诗》的著作就占109种。只有两种是解《韩诗》的，一是杜琼的《韩诗章句》，一是佚名的《韩诗图》14卷。并且杜琼的著述亡佚，没有流传下来。^②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兵燹之患最深重，诗经学文献大多亡佚，但从上述数字对比仍可以看出，在此时期，《毛诗》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巩固，已然占绝对优势，而三家诗因为没有传习者则渐次失传。《隋书·经籍志》载：“《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③

由此亦可以见出自魏晋至唐，《诗经》研究确已是《毛诗》一家的天下。南北朝时期，南学、北学研究《诗经》也都是承袭《毛诗》。只是风格上南学继承魏晋学风，崇尚玄

① 张可礼：《三国时期〈诗经〉学者著述叙录及其启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12期。

② 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一元代）》，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③ （唐）魏徵：《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25页。

学，重文辞，轻经术；重阐发义理，轻训诂名物，学风比较虚浮。北学继承东汉学风，排斥玄学，重儒道，轻空谈；重训诂，轻义理，学风比较朴实，但注经烦琐，不得要义。^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研究在经学的道路上继续，经学研究领域空前活跃，主要表现为诗经学史上的所谓“郑王之争”（郑玄、王肃）。王肃是三国时期的诗经学名家，皮锡瑞说：“是肃常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② 据此可以推知，王肃治《诗》应该是兼通古今，并不仅仅限于古文诗学。王肃通过作《毛诗注》来表述自己的学说，同时又作《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攻击郑玄，从而引起郑玄门人及支持者的不快，乃至整个魏晋时期的诗经学基本上都是围绕郑学和王学之争展开，并且涌现出大量的成果。比如孙毓的《毛诗异同评》、陈统的《难孙氏毛诗评》、王基的《毛诗驳》、崔灵恩集注《毛诗》、孙炎注《毛诗》等等，遗憾的是这些著述大多只存残页。^③

二、重视《诗经》名物阐释，诞生了第一部诗经学博物著作

先秦的诗学研究重在应用。孔子始创诗教，认为《诗》除了具有教养、教化作用之外，还有博学之用。孔子鼓励弟子：“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④

齐、鲁、韩、毛四家诗中，《毛诗》以解释名物见长。《毛传》《郑笺》都是直接解经，《诗》中有关草木、鸟兽虫鱼的解释一般都是在训诂词句的过程中随时加以解释的。到了

① 鲁洪生：《诗经学概论》，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②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6页。

③ 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7～230页。

④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5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中所涉及的名物又有再作解释的必要了,遂对《诗经》的名物进行了新的解释。“一些以训释《诗经》诗义为主的文献,也注重对《诗经》名物的解释,如魏刘桢的《毛诗义问》、吴韦昭、朱育等《毛诗答杂问》;晋人郭璞作《毛诗拾遗》一卷,也较多注重对《毛诗》名物的训诂。”^①可见,注重训释《诗经》的名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训诂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第一部将《诗》中名物加以汇集,专门给以解释的第一部《诗经》名物专著。全书共记载草本植物 80 种、木本植物 34 种、鸟类 23 种、兽类 9 种、鱼类 10 种、虫类 18 种,共计动植物 175 种。“陆疏”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关于疏解草木鸟兽虫鱼之作,自《陆疏》以来,毋虑数十家,清《四库》著录自宋至明凡四家,清前期六家(存目未计入)”^②,“陆疏”对后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三、《诗经》文献义疏体取代传注体并风行于世

在经学史上,汉代治经多以本经为主,传、注体是主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讲经风气的发展、佛教趺坐说法以及讲究玄学之风等因素影响了儒家说经,经学中的传注之体日渐衰微,而所谓六朝“义疏”之体,则日益盛兴,义疏取代经解,是经学由简约转向烦琐的重要标志,也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经学史上的大事。

“义疏”本是儒生讲经时所用的讲稿,亦可单称“义”或“疏”;所谓“义疏体”,不仅解释经文,也解释注文,并兼以

^① 郝佳敏:《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② 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4~235页。

表达儒生己意。汉代郑玄的《毛诗笺》已兼下己意，只是没有旁征博引，略显简单，却是这种文体的萌芽。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受上文所谈几点因素影响，义疏体著作开始盛行。据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魏晋南北朝可考的诗经学文献 111 部中，直接以“义疏”为名的就有 14 部。^①“另亦有一些不以‘义疏’为题的著作，实则也是义疏体，如后魏刘献之的《毛诗章句疏》、梁武帝的《毛诗大义》等。”^②就《诗经》而论，所疏的内容，都只是推衍《毛传》《郑笺》之义，但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可估量的，“《毛传》、《郑笺》由是而得以保存并广泛流传，在这一过程中，义疏也起过一定的作用”^③。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则认为：“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④

可见魏晋南北朝义疏的兴起与盛行，为唐代义疏的发展起到了筚路蓝缕之功，在经学史上，确是不容忽略的阶段。

四、对《诗经》的文学阐释与接受

这一时期《诗经》的文学研究，由于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人们对《诗经》的看法已经有了重大转变，《诗经》从“圣”到“凡”的跌落，使得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经》的风气日盛。^⑤譬如在对《诗经》的经学阐释中，“尽管三家诗特别是毛诗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但是由于儒学思想的逐步衰微，特别是由于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期，文学批评的风气开始形成

① 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② 李秀芳：《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文献特点述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 期。

③ 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235 页。

④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87 页。

⑤ 龙向洋：《从“圣”到“凡”的跌落——魏晋南北朝〈诗经〉的文学接受》，《琼州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与兴起”^①，人们也较多关注《诗经》的文学特性。再如，在创作中自觉引用《诗经》中的名句，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运用《诗经》的现象不胜枚举，如曹操的《短歌行》就直接借用《诗经》中的句子“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来书写自己的抱负。阮籍的诗也多用《诗经》意象来感怀政治。另外是对《诗经》的文学品赏，如见诸《世说新语》和《晋书》的谢氏品诗事迹。^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诗经》文学研究方面开一代新风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们，比如陆机、刘勰、钟嵘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使《诗经》的抒情特质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刘勰在积极吸收前人诗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诗歌创作的实际，在他的巨著《文心雕龙》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诗经观。从某种角度上说，《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也是一部较为系统的关于诗经学的著作。随后出现的钟嵘，在其著作《诗品》当中也对《诗经》的抒情特质、语言特点以及对后世诗歌的影响等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经学在文化传统上的深刻影响仍然存在，所以对《诗经》的文学阐释和接受带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特性，“评论家们没有跳出对《诗经》学地位的固有认知，在他们的《诗经》学研究著作中还保留着经学的成分，但文学的自觉不断壮大，文学与经学之间的张力增强”^③。陆理原从经学内部的文学萌芽、模仿引用中的文学取向、名篇佳句的文学鉴赏、部分诗旨的文学诠释及宗经理论中的文学内蕴等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这一过渡时期的特性。并且认为魏晋南

① 张启成：《诗经研究史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9页。

② 郝桂敏：《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③ 胡辉：《刘勰诗经观研究》，广西大学2008年，第7页。

北朝时期对《诗经》抒情特质的探讨、赋比兴的界定及其特点的诠释,以及对《诗经》语言特色的探讨是十分系统和深入的,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和艺术价值。这些成果大都被后世所继承或给后世以重要启迪。^①

魏晋南北朝的《诗经》研究,“所涉及的著作之多,观点之新,人群之广,都是前代所不及,是《诗经》研究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其成就不可忽视”^②。此时期的《诗经》研究特点,除前文所探讨的几个方面之外,还具有以图解《诗》盛行、帝王解诗、佛教徒、道教徒和玄学人物解《诗》、专门为《诗》注音的著作普遍出现,诗经学文献虽多,保存下来却很少,绝大部分亡佚等特点。^③限于篇幅及刍议之性质,在此不再一一论述。

总之,诗经经学研究此后余音袅袅,虽有起伏涨落却始终不绝于耳,对后来唐、宋的诗经经学研究起了奠基性和前导性的作用。这一时期对《诗经》的文学解读,不仅揭开了《诗经》研究新的一页,也直接影响到了后来唐宋诗人、文学家对《诗经》抒情性的传承、发扬和探讨研究,而就经学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而论,可以说研究的主流从经学向文学过渡是这个时期《诗经》研究最显著的特征,承上启下则是这一时期它们的共同特质,这也是诗经学史上时运交移、崇替在选的结果。

① 陆理原:《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一)、(二),《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2期。

② 余斯大、陆理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审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③ 李秀芳:《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文献特点述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第二节 刘勰诗经观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文学有两大显学，一是红学，一是龙学。《红楼梦》讲情，《文心雕龙》讲理；红学研究曹雪芹，龙学研究刘勰。”^①《文心雕龙》作为我国中古时期最早、最完备、最系统全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②，以其高度的理论性、总结性成就了令后人眩目的文艺理论辉煌。王更生说：“回顾《文心雕龙》的研究，在以往一千四百多年中，可约略有几个特色，大致是由唐宋至元明，学者对《文心雕龙》多作版本的翻刻、批评、音注，纯粹诠释的作品并不多见，由清初乾隆初年到宣统末年，因为黄叔琳辑注出现，并收入四库全书的关系，给《文心雕龙》研究打开了新局面。由民国开元以迄今日，在中国古典文论的园地里，由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率先倡导，把文学批评的界域带向一个理想的高峰。虽然校释的工作仍有不少人继续在作，但事实上已逐渐退居于次要的地位。无可讳言的，这是一个知识爆发的时代，由于印刷出版品的流布与知识交换的便捷，六十多年来，使《文心雕龙》的研究，有了突破传统的成果。”^③

追溯“千年文心”，重温“世纪龙学”^④，我们不难发现：1500多年的《文心雕龙》流传史，也就是1000多年的研究史。《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了集校勘、考证、注释、今译、理论研究为一体并且密切联系经学、史学、子学、佛学、玄学和美学的复杂而庞大的系统。武汉大学李建中从

① 李建中：《文心雕龙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③ 王更生：《文心雕龙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④ 李建中：《文心雕龙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